

跨世纪的纲领

广西人民出版社·徐耀新 著

KUA SHI JI
DE
GANG
LING



邓小平“南巡谈话”纵横论

跨世纪的纲领

KUA SHI JI DE GANG LING

——邓小平“南巡谈话”纵横论

徐耀新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002550

(桂)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 覃 宇

责任校对 林志茂

跨世纪的纲领

——邓小平“南巡谈话”纵横论

徐耀新 著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发行 广西新华书店

印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43 千字

版次 1992年7月第1版

印次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7-219-02080-5/D·334

定价 6.50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全国第一本系统论述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南巡谈话”思想的理论专著。作者以高昂的爱国激情、敏锐的政治目光、宏宽的历史视野、睿智的理论锋芒,旁征博引、纵横论述,对这次谈话的政治背景、理论内涵、历史意义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了深刻的探讨和精彩的阐述,从中可看到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博大精深和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高瞻远瞩。本书按其内在逻辑将“南巡谈话”分为13章37题,其中还针对各种“左”和右的错误观点和现象进行分析和批判。全书文字简洁、论说生动、材料丰富、见解独到,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学术性,既是一本有较高政治理论水平的学术专著,又是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领会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的理想教材。

031212

责任编辑：覃宇

封面图片摄影：江式高

封面设计：李筱茜

作者简介

徐耀新，1959年生，江苏海门县人。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大政教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获硕士学位；1988年晋升为副教授。现任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理事，江苏省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江苏省科社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南京师大政教系世界政治和国际共运史教研室主任。著有《社会主义改革史》（3人合著，70万字，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新编国际共运史（1847—1987）》（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共产主义者同盟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科学社会主义新编教程》（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专著、教材10余部，发表了《世界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动因、危机和希望》（《国际共运史研究》1989年第1期）、《新科技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南京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等论文和文章70余篇。

ISBN 7-219-02080-5/

D·334 定价：6.50元

序一 学习“南巡谈话”，加快改革步伐

胡福明

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犹如春风，吹遍中华大地，鼓舞和启发了亿万人民群众。一个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的高潮正在兴起。

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发表的。1989年秋天起，东欧剧变，特别是苏联于1991年8月解体，雅尔塔体制彻底瓦解，两极对立消失，世界向多极化发展，这是国际局势战后最大的变动。我国于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政治风波。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党内“左”的思潮又逐渐滋长泛滥起来。这种思潮的特点是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把反和平演变搞得比什么事情都重要。有人说，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是阶级斗争的最大反映，现在应该提阶级斗争为纲；还有一种看法是多引进一分外资，就是多一分资本主义，就是发展资本主义，“三资”企业是和平演变的阵地；也有人说，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土壤；有人甚至认为“文革”的理论中阶级斗争的观点

是合理成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个论点也是对的。特别是,发生了一场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事的起因是这样的:《解放日报》根据小平同志1991年春节期间视察上海时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的笔名于1991年3月2日、22日和4月12日发表了三篇重要评论。其主要论点是:“90年代上海的开放迈开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于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囿于‘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茫之中,那也只能趑趄不前,难成大事”。一些报刊明知这三篇评论的由来,却仍然发表文章进行攻击。有个刊物,发表了《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专文,该文开头就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然有些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社还是姓资’究竟该不该问,正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文章又说:“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把改革当作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该文攻击所谓不问“姓资姓社”,是“为自由化改革观的泛滥打开方便之门,以至于把改革引向斜路。”该文甚至认为允许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滋生剥削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乃至为剥削阶级思想上政治上的代表人物的产生提供土壤”。《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不仅认为改革开放必须问姓“社”还是姓“资”,而且干脆认为改革开放产生资本主义。非常明

白,“左”的思想是要否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否定改革开放。这篇文章发生在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显得更为复杂。党和人民再次面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改革开放还是倒退回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还是回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大问题。这是关系到党、国家和人民前途与命运的最大问题。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渴望解答这个问题,渴望遏止“左”的思潮。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同志经过长期观察、酝酿,终于在南巡过程中发表了重要谈话,坚定地鲜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小平同志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只能是死路一条。党的基本路线,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成果,是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0 多年的实践证明的正确路线,来之不易,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因而,“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从根本上否定了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主张,否定了把反和平演变搞得比什么都重要的错误做法,从根本上解决了人们怕政策变的顾虑,安定了人心,坚定了人民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首先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我国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很低,科学文化不发达,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更要一心一意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以壮大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由之路,是

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途径。落后必定挨打,这是历史的结论。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和当代世界的特征决定了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现代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必然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又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发展生产力开辟了道路。党的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不发达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矛盾,并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党的八大正确路线被否定了。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作为主要矛盾、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党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经过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放思想,破除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拨乱反正,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形成了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科学文化事业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正因为如此,当人民群众近年又听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论调时,不免重新引起对“文革”时期的痛苦回忆,不免担心再搞“文革”那一套。人民群众担心党的政策变,首先怕再搞阶级斗争为纲,否定经济建设为中心。当广大群众听到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时,自然欢欣鼓舞了。

邓小平同志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切中时弊。右的东西确实有,如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就是右。对右一定

要警惕，决不能让其泛滥。但现实生活中，主要是“左”的东西在阻挠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这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在党的历史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次数多，时间长，危害大。由于“左”的思想、路线、政策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帜，所以特别能迷惑人，欺骗人。“左”的思想是主要的，还在于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是“左”的思想的产物，而这种体制在社会主义国家已盛行了半个多世纪，在中国也持续了20多年，人们都习惯了。“左”的思想根深蒂固，还由于历史上常把犯“左”的错误说成“思想方法问题”、“认识问题”，而把犯右的错误说成“立场问题”，对前者处理宽，对后者处理严，所以，长期内形成“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错误看法。一些人出于种种目的就奉行“宁‘左’勿右”。现实生活中“左”的表现主要是本本主义，停留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主义的理解上，停留在苏联模式上，或者是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的、甚至是扭曲了的认识上，或者是停留在改革开放前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和政策上，或者是停留在“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上，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上，而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我国具体实际，因而违背了马列主义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经验。

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小平同志从近70年的革命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深刻结论，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了如指掌。他曾同右与“左”作过长期而坚决的斗争，对右与“左”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有亲身的感受。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使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数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邓小平同志同其他共产党人一起，为挽救中国革命进行了英勇无畏的斗争，组织领导了百色起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同志坚决拥护毛泽东同志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进行过长

期坚决的斗争，遭到过王明路线的长期打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根据地和红军损失90%。“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遭到了“左”倾路线更加严重、长期的打击。1975年，小平同志为纠正“文革”“左”的错误作过英勇的斗争，但又一次遭到严重打击。小平同志一生既坚决反对右，又坚决反对“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是付出了血的代价获得的结论，是由历史证明了的正确结论。过去，人们看到了右的危害，懂得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但对“左”的危害估计不足，不了解“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这一种认识不全面。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才是全面的科学的认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也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的中心思想是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重点在强调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加速经济发展，使我国经济上一个新的台阶。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是坚持两手抓，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决不手软。对外开放，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某些地方出现了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丑恶现象。一定要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泛滥。这方面，社会主义也比资本主义优越，我国解放初用短短三年时间曾经消灭了各种丑恶现象，现在，我们也一定能够扫除这些丑恶现象。在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努力发展科学、教育文化事业，要切实加紧廉政建设。要依靠法律的手段坚决惩治腐败。

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在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路线和政

策,这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发展。历史已经证明,每个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把马列主义原理与本国实际结合,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道路。世界上没有共同的社会主义模式。怎样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怎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同的三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功绩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争取解放的道路,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提出了科学设想。但马克思、恩格斯未能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因而对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可能作出具体的回答,他们也没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列宁作过很多探索,走过弯路,提出了合作制、新经济政策等一系列极有意义的思想,但他过早逝世了,没有能够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工业化,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这是他的功绩。但是,苏联农业集体化中强迫命令是相当严重的,集体农庄这种形式也未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苏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在实现工业化中起过集中资金加速发展重工业的作用,这对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联是可以理解的,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弊端早就存在,而且日益发展,长时期内否认商品,否认价值规律,排斥市场,扭曲价格,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压制企业与劳动者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和新科技革命,国民经济部门长期严重比例失调,农业、轻工业长期落后,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提高不快。斯大林在晚年承认生活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这是进了一步,但未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与高度

集中的经济体制相适应,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实行个人专断,搞个人崇拜,严重破坏党内民主,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以致造成了滥用权力、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恶果,违反民族平等原则,搞大俄罗斯主义。斯大林没有能够正确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致力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与政策,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又领导中国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的伟大功勋是不朽的。但是,毛泽东也没有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曾经提出过不少建设社会主义的精辟见解,也进行过探索,但是未能贯彻到底;他曾经主张走自己的路,建设社会主义,但是,他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陷入了主观主义与个人专断。“左”的思想逐渐发展,终于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违背了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造成了“文革”十年内乱,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一场灾难。毛泽东未能正确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78年,邓小平坚定地支持和领导了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全面拨乱反正,实现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强调实事求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致力于把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号召和领导改革开放,使改革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到城市经济改革,打破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建立适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经济体制;他主张在公有制为主体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与一定的发展,在按劳分配为主下允许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允许

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勤劳致富，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他提倡对外开放，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利用外资，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他坚持实事求是，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动乱，强调依靠人民民主专政以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他提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他提出，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改革开放的同时，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坚持两手抓，两只手都要硬；他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到下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点，主张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要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把发展教育放在战略地位；他提出了正确的外交政策，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形势下，又提出了正确方针；他指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与市场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他提出，要按照“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标准培养和选拔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保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政策长期坚持下去，保证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他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一百年不变。要抓住有利时机，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实事求是，敢闯敢试敢冒，加速经济发展，使国民经济过几年上一个新台阶，中国要有几个跳跃式发展的阶段；他指出，区分姓“社”姓“资”的标准是三个“是否有利于”，即以生产力作标准，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等等。概括地说，邓小平同志提出

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政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第一次科学解决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伟大的贡献。我们必须结合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系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著作和论述,以全面地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政策。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实践中坚定地、全面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发表后,徐耀新同志就以很大的热情写作《跨世纪的纲领》。徐耀新同志是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虽然年轻,却已出版过几部专著和发表了多篇论文,研究社会主义功底颇深。在这部著作中,他从我国现阶段的历史任务出发,系统地阐述了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的基本思想、主要精神。由于徐耀新同志密切联系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联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联系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著作、文章、论述,所以内容很丰富,论述比较透彻,在某些问题上还提出了精辟见解。实际上,作者是把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与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进行研究,把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徐耀新同志认为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是跨世纪的纲领,即到下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纲领,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指引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唯一正确的理论、路线、政策。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时,读读《跨世纪的纲领》是有益的。

1992.7.9于南京

序二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展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高 放

当前,全国人民都在欢欣鼓舞地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迫切需要有一本导读和深入研究的好书,以加深领悟其精髓真义。现在我郑重向读者推荐青年学者徐耀新同志撰写的这本力作。

耀新于198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由我指导取得了硕士学位。由于他品学兼优,各门课程全优科研成果突出,外语水平较高,本来本校研究生院已经批准,允许他免试在我指导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因南京师大工作急需,立即调他回去。几年来他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异常勤奋,殚精竭虑,成绩斐然,硕果累累。他思想解放,充满锐气,既反对思想僵化,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站在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前列。1987年出版了他与李忠杰、魏力合著的《社会主义改革史》;1990年在他参与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新编教程》中特意把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并列为三篇。这两本书我都认真拜读了,并作了序。他可

以说是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他们的成长与成就，同我国改革开放的命运息息相关。今年2—3月间，当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要点刚刚传遍大江南北，他就与王振义同志一起主编了辅导性的《东风又催改革春》一书，同时又独自奋力写成这本学术专著。本书本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力求全面、系统、准确地阐发邓小平南巡谈话的要点。全书纲举目张，条分缕析，视野宽阔，纵横论说，重点突出，说理充分，资料翔实，深入浅出，新意迭现，论述生动，文字流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学术性和可读性。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校长胡福明同志在通读书稿之后，已经为本书写了一篇有份量的序言。但是作者和广西人民出版社还几次提出希望我也能为本书另写一篇序言。耀新一再说明书中引述了我们共同研讨过的许多共同观点，还引用了我同几位博士生合写的《论〈第三次浪潮〉》一书中的某些见解。盛情难却，我只好遵命把自己学习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粗浅体会写下，实在难领其首，只好权充装点门面。广西人民出版社以最快速度赶出此书，做了一件好事，值得称颂。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党的领导角度来看，最大的成就就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带领下，纠正了长期以来“左”的失误，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使广大干部从“左”的禁锢中获得思想解放。通过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我们党才能指引我国广大人民在近10多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多方面的显著成果，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今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南巡中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依我粗浅体会，最主要之点就是针对近年来“左”的干扰，重申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并且进一步发展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跨世纪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构建了新的蓝图，使我们深切感受到又一次获得思想解放。